



卓越学术文库

英国维多利亚末至爱德华时期 文学中的殖民主体研究

YINGGUO WEIDUOLiya MO ZHI AIDEHUA SHIJI WENXUE ZHONG DE ZHIMIN ZHUTI YANJIU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李长亭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卓越学术文库 ■

英国维多利亚末至爱德华时期 文学中的殖民主体研究

YINGGUO WEIDUOLiya MO ZHI AIDEHUA SHI QI WENXUE ZHONG DE ZHIMIN ZHUTI YANJIU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李长亭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维多利亚末至爱德华时期文学中的殖民主体研究/
李长亭著.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7.3
(卓越学术文库)
ISBN 978-7-5645-3398-4

I. ①英… II. ①李… III. ①英国文学-近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56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2317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张功员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710 mm×1 010 mm 1/16

印张:14

字数:267 千字

版次:2017 年 3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电话:0371-66966070

印次: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5-3398-4 定价: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前 言



维多利亚末至爱德华时期在英国的历史发展中是一段重要时期,在世界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并开始由盛转衰。欧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世界许多地方沦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其次,赫伯特·斯宾塞宣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学领域里的发现应用到社会领域之中,强调社会领域的优胜劣汰,从而为愈演愈烈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优越论提供理论支撑。再次,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曲折的反映。文学作为时代发展的镜像,在意识形态层面映射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因此,阅读英国文学,就是阅读英国在各个特定时代的案卷。在物欲横流、殖民霸权的时代,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逐中,道德与欲望之间的博弈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在英国殖民文学中,作者通常通过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殖民行为和主体分裂来曲折地反映各殖民地的风土人情、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爱恨情仇以及对社会造成的各种影响等。本书选择约瑟夫·康拉德、E. M. 福斯特和鲁德亚德·吉卜林等作家的代表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些作品中殖民者形象的深入解读可以体察到当时英国社会的对外政策及其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

本书系统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语言学理论,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阐释作品中殖民者形象的结构和解构过程,把主体形象置于宏阔的语言环境中进行后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分析。殖民主体代表了西方文明的成果,然而他们在殖民地的异常表现,遭遇拉康所谓的“实在界”,表明这些所谓的上帝选民只不过是披着神圣的外衣而已,并没有异于当地土著人之处。本书所分析的作品影射了人性的多面性、矛盾性和难以捉摸的特征。他们的身份危机来自于想象界与象征界的差异,他们不能与自己对世界的想象统一起来,从而导致主体身份的异化和分裂。因此,责任背叛、精神失常等情况常常贯穿于这一系列作品中。由于人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处于异化和孤独状态,如果我们能学会把异化和普遍性放在一起思考的话,那么,我们就会

对我们的共性包括困境有一种新的认识,从而就会在黑暗里开启一束亮光,建立起一个和谐、包容的社会空间。本书从“主体间性”的角度论证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体和他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双方互为镜像,互为依存。因此差异的存在是保持社会丰富多彩、健康稳定的前提和保证。

总之,本书通过对维多利亚末至爱德华时期殖民地文学中殖民者形象的研究,揭示这些海外殖民者的主体异化过程,并通过将人类世界的秩序和价值体系置于一个特殊时期和特殊背景下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和反思,以探求人类存在的当下意义,探索目前在建立和谐社会过程中应关注的问题和环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家人和学校同事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本书也获得了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的出版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写作时间仓促,加之本人学术水平有限,虽做了多次修改,但书中定有不少谬误,恳请方家不吝赐教!

李长亭

2015 年 10 月



目录

绪论	1
第一章 《黑暗的心》《进步前哨》:非洲荒原上的“文明传播者”	21
第一节 库尔茨:欧洲文明的使者	24
第二节 凯亦兹和卡利尔:虚幻的进步使者	56
第二章 《吉姆老爷》:马来半岛上的“不归客”	64
第一节 对海洋生活的浪漫背叛	67
第二节 浪漫的殖民世界	76
第三章 《诺斯托罗莫》:物质利益的追求者	102
第一节 诺斯托罗莫:从“响当当的男子汉”到物质利益的牺牲品	108
第二节 高尔德: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	117
第三节 德考得:怀疑主义者	122
第四章 《基姆》:殖民者的文化身份	128
第一节 英国在印度的殖民背景	128
第二节 鲁德亚德·吉卜林:帝国号手	131
第三节 基姆:主体身份建构	136
第五章 《印度之行》:众声喧哗的旅程	162
第一节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传统	162
第二节 《印度之行》中的印度他者	167

第三节 殖民者群像	180
结语	203
参考文献	206

绪 论

(一)

在英国发展史上,维多利亚时期被认为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顶点时期,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经济富庶,殖民地遍布全球。英国社会从19世纪50年代直到70年代初都处于比较稳定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英国工商业在海外殖民地大规模扩张,快速发展的机器工业也使英国超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收获了更多的社会资本。在1800年,各西方大国拥有地球表面35%的土地,而到了1914年,欧洲各国占有地球上大约85%的土地,其中包括殖民地、保护地、附属国、自治领和联邦成员国等^①。正如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所说的,“世界前所未有地统一为一个整体”^②。萨义德指出:“帝国主义的一大功绩是把世界缩小了。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把欧洲人和殖民地人民隔离是有欺骗性的,绝对不公正的,但是我们大多数人今天应该把帝国主义这一历史经验当作是属于大家的。”^③尽管宪章运动后示威和罢工仍在继续,但英国1867年颁布的第二个改革法案进一步缓解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1876年,英国夺取了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维多利亚女王也成为印度殖民地的女皇。这标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建立起来了。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急剧衰竭。由于澳大利亚的羊毛和美国的小麦如洪水般涌进英国国内市场,英国农业彻

^①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页。

^② William, McNeill. *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261.

^③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摘自刘大椿主编《百年学术精要》,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711页。



底破产,而美国和德国在工业生产竞争中的崛起,则导致英国损失了之前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工业垄断。这些因素于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不列颠群岛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即便如此,英国统治阶级仍然有其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力量。在国内,他们继续贿赂“工党贵族”和传播维多利亚时代“繁荣”的神话;在国外,他们保持甚至扩大殖民压迫和剥削,并在亚洲,特别是在非洲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在殖民地的扩张过程中,获取巨大的物质利益是他们的第一要务。他们在殖民地疯狂掠夺香料、糖、橡胶、棉花、鸦片、锡、金、银等物质财富,而在非洲,他们还把当地的黑人作为奴隶进行交易,并把他们作为私有财产运回国内。

19世纪末期,伴随着政治和经济领域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变化,在英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意识形态之间,即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除了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的“工党贵族”,还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辩护者,他们鼓吹的观点是,在亚洲和非洲及其他地方的殖民地民族是劣等种族,是“白人的负担”。对这些劣等种族的统治是正义的、合理的,殖民者和传教士给生活在黑暗和原始状态的土著带来的是文明和进步。然后还有其他辩护者采用了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也同样适用于人类世界。总之,当时主要有几个不同阵营的哲学思想,即社会主义拥护者,对政治和经济现状的批评人士和反对社会不公的呼喊者,悲观主义者和以微弱的方式批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逃避主义者以及公开的或隐蔽的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辩护者^①。

在对殖民地进行经济和技术殖民的同时,殖民者更重视文化方面的殖民。他们要对原住民进行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变,让这些土著能够接受应该被殖民的观念,使这些善良的人们认为,优等种族对他们这些劣等或蒙昧种族的教化和殖民是上帝恩赐的、长期的、形而上的义务。作为一个海洋岛国,英国17世纪取得了海上霸权,18世纪获得了广阔的海外殖民地。它在美洲、非洲和亚洲,都有自己的殖民地和海外利益。小说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和工具也应运而生,形成了英国语言和文化实践结构中最为活跃的一部分。

现代主义小说聚焦于主体意识与外界间的张力。外部世界影响着主体意识的形成和内容,并逐渐掏空了主体原本属于自己的元素,置换进千篇一律的东西。现代主义者试图表现二者间的矛盾和差异,以便从看似无意义的斗争中发现意义。他们从艺术本身找到了将日常生活的偶然性转化为有意义的形式结构的方式。然而许多现代主义小说家发现,表面上的分裂与

^① Chen Jia,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p384.



无意义的社会生活,以及小说主体本身存在的有意义却无力量的意识之间存在着另一种不太常见的调和形式。“我们对于外部世界以及彼此间的感知带有文化特质或者个体特质的缺陷,以至于在不同个体或集团的归属问题上可能没有绝对公平的方式——没有永恒事实,没有绝对真理,因此没有绝对正义。”^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民族自由运动在整个欧洲风起云涌,并蔓延至世界其他地区。自由民族主义似乎在1919年《凡尔赛公约》中取得了胜利。根据该公约,获胜方沿国家界限重新绘制了欧洲地图,将民族性原则写入国际法中。然而,在同一时期,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间的原则分歧日益明显。新的民族-政府的“根本”概念冲蚀着20世纪自由民族主义的传统政治。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新建立的自由民族-政府制度受到独裁政权的攻击。在英国,“帝国主义”一词被赋予新的用法,用来表述民族主义者进行海外冒险的宣传运动^②。

根据民族主义有机论,社会的基本单位不是个体而是种族群体。这些群体被冠以“国家”或“种族”的不同标记。个体不是作为追求自己利益的自发的、合理的代理人,而是一种潜在的种族身份的投射,不自觉地追求群体的利益。他们在国家群体的成员身份形成了他们的意识。在现代主义小说中,意识总是由T. S.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所谓的“非个人力量”的因素决定的,这种意识反映了个人是被诸如国家或种族意志的集体身份所操控的。约瑟芬·盖(Josephine M. Guy)认为:几乎维多利亚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个体与社会间的关系。社会环境是固定的,小说家关注的焦点是个体而不是社会的变化可能性。读者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活动来了解社会。在个体和社会间的冲突中,读者应考虑社会环境如何影响个体行为,个体行为如何根植于“人性的规律”(laws of human nature)。约瑟芬·盖还指出,重点不是个体如何改变世界,而是什么组成了人性的本质^③。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鲁滨孙漂流记》是英国历史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它通过鲁滨孙这一个体形象地反映了英国的对外殖民过程。

小说讲述了一位英国“海洋骑士”在一个远离欧洲的荒岛上为自己建立

① Pericles Lewis, *Modernism, Nationalism, and the Nov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5.

② Pericles Lewis, *Modernism, Nationalism, and the Nov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6.

③ Josephine M. Guy, *The Victorian Social-problem Novel*, Macmillan Press, 1996, pp. 68 ~ 81.



了一块殖民地的故事。小说一方面确立了欧洲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建构了最初的欧洲殖民话语。在小说中,驱使主人公五次航海的动力就是对于海外财富的渴望和对陆上权力的向往。因为如果没有殖民使命允许鲁滨孙在荒野之地去创造自己的新天地的话,那么他的行为就是不可思议的。小说主人公鲁滨孙最初到非洲经商,不过进展得并不顺利,甚至最后被卖身为奴。逃脱后,他在巴西置办了庄园,准备到非洲去贩卖黑奴。结果因在海上遇难,漂泊到一座荒岛上。在这座渺无人迹的孤岛上,鲁滨孙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智慧,终于成为荒岛的主人和统治者。他在小岛实行文明化、殖民化和资本主义化管理模式。他与被“驯化”的土著星期五之间的关系代表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鲁滨孙漂流记》明确地表达了欧洲资产阶级征服非西方世界的思想,为英国的航海小说建构了一种范式。它使海外扩张的思想得以明晰,其叙事风格与形式都与当时的探险旅行这种奠定大殖民帝国的基础的东西有直接的联系”^①。在西方殖民史上,鲁滨孙可以说是帝国文化培育出来的第一代典型的殖民者。瓦特(Ian P. Watt)对他们的历史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那些航海探险家在16世纪功劳卓著,他们提供贸易扩张所依赖的黄金、奴隶和热带植物,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17世纪时,他们通过开发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所依赖的殖民地和国际市场,依然继续这一进程。”^②然而,鲁滨孙这个殖民者却是以强盗行径实施自己的占领和统治的。他自封为岛国的主人。置身幽静怡人的山谷,环顾四周,他暗自欣喜:“这一切都是我的,我就是这里无法废除的国王。”^③此后,他时刻不忘“我是这儿的地主,如果我乐意,我可以称自己是这块土地的国王或皇帝”^④。所以,入侵者鲁滨孙绝不允许海岛的当然主人染指这个独立王国。土著留在海滩上的脚印,以及他们虐杀俘虏的现场,都使鲁滨孙怒不可遏,其根源倒不是恼怒他们同类相食,而是气愤“他们竟跑到我的地盘上撒野”。为此,鲁滨孙决定采取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必要时大开杀戒,用火枪血洗敢于侵犯他的领地的土著人。他多次咬牙切齿地说,“恨不得让他们二三十个人死在我的剑下”,“恨不得杀他二三十个光着身子的野蛮人才解恨,不管这行为本身多么惨无人道”^⑤。正如加拿大批

① 赛昌槐:《西方小说与文化帝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② 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9页。

③ 丹尼尔·笛福:《鲁滨孙漂流记》,张蕾芳译,南海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76页。

④ 丹尼尔·笛福:《鲁滨孙漂流记》,张蕾芳译,南海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97页。

⑤ 丹尼尔·笛福:《鲁滨孙漂流记》,张蕾芳译,南海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28页。



评家戴安娜·布莱顿(Diana Brydon)指出的那样:“探险家们从来也没有‘发现’什么土著人在那之前不知道的事……鲁滨孙的‘处女’岛代表了帝国主义文化的扩张意愿,也说明了帝国主义者患了健忘症。这种健忘症状决意对过去的所有权一笔勾销。”^①

史蒂芬·格林布莱特(Stephen Greeblatt)认为:“自我只有在与异化、对立的事物相关联时才能建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这种威胁性的他者必须要被找出来,甚至被臆想出来并使之成为攻击和破坏的对象,只有这样自我才能建立起来。”^②他者尽管存在于自我之外,但却是自我存在的一个内在必然条件,被自我内化,成为巩固自我地位的一个中心成分。因为他者本身也是不稳定的,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因此,维护他者的相对稳定就要求对他者进行不间断的监管和界定,同时,自我也要远离那些不断被发现的、新的他者。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对基于现存社会等级秩序的集体身份感到焦虑,成为最激进的种族科学的提倡者。他们在原有的种族边界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种族他者。通过对他者的命名、定义,以及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方面的干预,来确立和巩固他们的身份。

欧洲白人在征服全球的过程中,从未将有色人种引为同类。在早期殖民者开化土著人的宏伟蓝图中,存在着明显的文化范式。笛福通过对“食人生番”的描写,率先在其他文化不在场的条件下,贴上了欧洲对他者“妖魔化”的标签。正是这种写作策略使作者对“食人生番”的野蛮化书写构成了《鲁滨孙漂流记》中最阴暗的一部分。在欧洲文明中,潜藏着一种替罪羊原型,即把一切瘟疫、邪恶、罪过都附集在一个人身上,然后将其驱逐,借以避邪。笛福对美洲土人的野蛮化书写,同时也包藏着转嫁灾祸的深层文化心理。

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帝国不再是一种模糊的存在,实际上的土地占有成为帝国的最终目标。先后担任过英国驻印度总督和英国外交大臣的库尔森勋爵曾经志得意满地说:“我时常喜欢把这个伟大的帝国描写成一个巨大的结构,就像丁尼生的‘艺术宫殿’,它的基础就在这个国家,必定由英国人奠基和维修,但是,殖民地却是它的支柱,而高高在上的是浮动的硕大的亚洲穹隆。”^③道格拉斯·洛瑞姆(Douglas Lorimer)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人

① 吉尔伯特:《后殖民批评》,杨乃乔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5页。

② Stephen Greenblatt,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More to Shakespea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9.

③ 爱德华·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们把黑人看作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对立面。从这些黑人的反面意象中,可以清楚地体察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独特性。”^①这一时期的英国小说则对强权进行了详尽而具体的描写,在1880年以后越来越露骨地表现出普遍和大胆的帝国情感。小说家们从不提出放弃殖民地,而是随心所欲地根据描写的需要来使用这些疆土,以致英帝国主义的殖民描写成为一种连续性的叙事风格。非洲作家齐努瓦·阿切比(Chinua Achebe)曾经指出,由于某些可以用于细致的心理分析的原因,西方人似乎为自己文明的不稳定而焦虑不安,因此,“他们急需用非洲来不时地与其比较以取得心理平衡。如果文明日益发展的欧洲,不时地回过头来瞧一眼仍然处在原始野蛮时期的非洲,当然,它会更有信心地、更充满感情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前进了!’”^②。在康拉德(Joseph Conrad)、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这样一些作家的作品中,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地的形象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因为他们的表现代表了白人种族在殖民地的整体表现。

(二)

康拉德不仅是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而且对于理解20世纪英国文化而言,他的作用也尤其重要:“他为英国小说及道德传统带来了新的心理和道德力量。他认识到了人们在应付被压抑的欲望、无意识动力和莫名的冲动中所起的作用。因为他想突出作者如何应对话语和意义间的张力,所以他关心的是说话者而非讲述的故事。”^③作为波兰裔作家,康拉德又是法律意义上的英国公民,他对独立运动的同情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对英帝国忠诚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在谴责荷兰殖民者的时候,他没有赋予专制的布尔人任何自由的概念,好像它是深深地根植于英国民族性格及历史之中的唯一品质,具有排他性。康拉德的波兰背景又使他对别的民族及民族性持矛盾态度。而这与当时的民主发展不相吻合。而且在强权政治下,又失去他所属阶级的传统含义,他对波兰民族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德国、俄国这些他者的定义,可他却又时时斥之为对波兰精神有损^④。

康拉德是个对文明发展充满忧思的作家。他要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作家

① Douglas Lorimer, *Colour, Class and the Victorians: English Attitudes to the Negro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Holmes and Merier Publishers, 1978, p11.

② 吉尔伯特:《后殖民批评》,杨乃乔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页。

③ John Richetti,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p685.

④ Petra Rau, *English Modern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Germans, 1890 - 1950*, Ashgate Publishing, 2009, p31.



都有更为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现代批评意识。由于不是地道的英国人,有时候他感觉自己在说话时很难让别人理解自己。他在作品中设置的很多背景如船只、荒岛、孤零零的贸易站等进一步突出了沟通交流的重要性。在社会-语言层面上,不与他人交往的主体只会使自己隔离于社会之外,成为社会逐客。主体与他人间的沉默沟壑注定要充盈着猜忌、流言、欺骗等内容,如怀特在船上的沉默引发了船员间的不安和猜疑。那些游离于集体经验之外的主体最终会脱离集体,不再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也许有许多原因来说明为什么一些主体不能与他者进行交流,但是对康拉德而言,主体创伤性的经历是阻止他融入集体的主因,因为它破坏了梦想与现实间脆弱的平衡。创伤性的经历常常是指主体犯下的致命错误却不自知,比如吉姆的一跳,诺斯托罗莫偷藏在岛上的银锭,等等。因此,主体很难靠语言来弥补外界与内心世界间的隔阂,因为内心的想望总会遭到外部现实世界的抵牾,导致创伤性经历。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他的《批评与意识形态》一书中,认为康拉德的作品中弥漫着一种“事实与价值的分离、理想与现实的分离、物质与精神的分离、自然与意识的分离”^①。有些人物如马洛(Marlow)运用语言进行心理治疗。语言的作用就是搭起现实与幻想间的桥梁。马洛是一个具备话语能力的人,因为他是一个社会中人,具有洞悉话语背后隐藏着的意义的能力。但马洛意识到,有时候语言是和现实相分离的,语言和现实具有不同的特质。他使吉姆(Jim)和库尔茨(Kurtz)亲口讲出了他们自己的故事,他虽不能拯救他们,但至少拯救了自己。他通过向别人讲述他们的故事来救治自己的心理创伤。而且马洛还能够讲述“另一种语言”,也就是谎言。他知道他必须对库尔茨的未婚妻说谎,使她不会受到他实际听到的话语现实的影响:“我振作精神,慢慢说道。‘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的名字。’”^②

在《黑暗的心》中,“我们见到的是一个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了的非洲,就某些方面来说,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化了的非洲”^③。作者采用套装叙事的形式,即故事由不同的讲述者来讲述,就像俄罗斯套盒一样。在小说开始部分,讲述故事的英国人以及那四个听故事的人不认为这是个特别英国式

^① 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Verso Press, 1976, p42.

^② 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薛诗绮等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以下相关引文皆出自该书,只标注页码,不再详注,个别引文略有改动。

^③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1页。



的故事。小说的主要讲述者马洛将库尔茨的堕落视为欧洲的堕落而不是英国的堕落,因为“整个欧洲都为塑造库尔茨做出了贡献”。然而,英国在这部小说论及的欧洲与非洲的关系方面起到了特殊作用。非洲的阴霾也笼罩在英国上空。马洛无法就自己对库尔茨的依恋做出合理的解释。这表明,库尔茨对英国以及英国性的吸引力已经战胜了马洛。马洛的伦理框架无法充分解释神秘的“隐藏的重要事物”。马洛的意识活动是故事的核心。“他的言语行为——试图找出合适的词汇——和他的回忆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像他的刚果之行一样。寻求讲述自己在刚果的经历的视角以及如何用语言表达这段经历是故事的中心所在。”^①

马洛似乎很渴望捍卫英国的传统观念,这些观念包括“效率”“自由”“真诚”“人性”“公正和正义”等。他试图将讲效率和人道的英国人与其他欧洲殖民者区分开,这些英国人根据法律实施统治,指导人们从事“真正的工作”,而其他欧洲殖民者纯粹为了物质利益而歧视和压迫当地土著。他们视所有当地人为“敌人”和“罪犯”。然而,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受到了两个战线的进攻。一方面,国家品性的确定性理论暗示了马洛与英国“观念”联系的价值,不是信奉共同信念的结果,而是不同国家间的本质差异的结果,是关于“英国特质”的残酷事实的结果;另一方面,小说中以库尔茨为代表的普世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方兴未艾,扬言要消灭文化差异,弘扬英国的特质和传统。这些为维多利亚自由党所追捧。在自由党的政治运动中,两大阵线辉格党和激进党之间发生冲突,表现在19世纪80年代的爱尔兰自治问题上。老派的辉格党出于维护英国特有自由的目的,一方面让路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另一方面让路于新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愿望。《黑暗的心》上演了世纪之交英国自由主义内部的冲突,传统的辉格党捍卫自由价值以及日益增长的普世的、国际主义的民主愿望,反映的是英国的国家特性。不过这些特性未必适合其他国家。小说展示了英国自由民族主义由于与帝国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冲突而陷入僵局的过程。在本书的后面部分将详细分析殖民者库尔茨在殖民地的堕落史。

马洛在叙述伟大的刚果之行时谈到,就帝国主义在非洲大陆的行径而言,比利时人的贪婪和英国人的拯救形成了对比。康拉德的叙事表明,非洲人和欧洲人具有共同的人性:英国人也曾经被罗马人征服过,英国也曾经是地球上最黑暗的地方之一。欧洲人不仅需要法律和制度来约束他们的返祖冲动,而且比起那些他们认为需要文明教化的野蛮人来说,他们显得更为可

^① John Richetti,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p692.



怕。萨义德指出,在这种背景下的“拯救”是个有趣的概念。它把英国人和罗马人与比利时人区别开来。他们的贪婪没有给他们的良心带来任何好处。而英国人之所以得救是因为他们不需要面对他们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土著居民完全被他们的统治所包容。当他们面对殖民地的迫切需要时,他们自己又被这些需要所包容。“康拉德的小说包含了帝国主义的两个十分不同但有紧密相关的方面:一方面是一种以力量掠夺领土的思想。这种思想很清楚自己的力量和它所带来的后果;另一方面,它通过在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和维护者之间确立一个自发的、自我肯定的正当的权威体系,来推行一种模糊或掩盖这种思想的实践。”^①不过,马洛在泰晤士河上讲述自己在非洲的经历不仅把这两个地方联系在了一起,而且也使人们认识到,黑暗非洲的画面纯属欧洲人的主观臆想而已。

在《吉姆老爷》中,吉姆起初很单纯、孤傲,沉浸于单一文化和单一语言的内心世界,能够把语言置于自己的想象但不是现实之中。但是,在经历了帕坦那件事后,他的梦想被击得粉碎,现实牢牢地抓住了他,他只得躲到帕图桑寻求避难。吉姆轻而易举地成了那里的“爷”,因为帕图桑是一个文化、语言杂交的地区,周围的人都说着不同的语言。改变语言也就等于改变了生活,因为在一个陌生的语言环境中,主体更容易摆脱创伤性的经历如羞耻、背叛、谎言等。但主体在说外语时,他便与自己的言语有了距离,但也能使主体通过新的语言重塑自我。吉姆能够轻而易举地凭借语言打败谢里夫·阿里和阿郎,因为他们不了解吉姆的过去。吉姆致命的“一跳”不包含在他们的话语范围之内。不过,有趣的是,在面对白人时,吉姆既不会侃侃而谈,也不会撒谎,因为那些白人不但和他具备同样的文化和语言,而且也可能了解他的过去。这就是为什么他被迫向马洛忏悔并被强盗布朗击败的原因。在多文化的社会里,凭借华里士和玉儿这些土著人的信任,吉姆重塑自己的内心世界,努力忘记过去。人们对他的赞誉使他几乎恢复了往昔的纯洁。“尽管他还不善言谈,然而在他的话语中包含有深层的意蕴。”“看看这些房子,没有一处不信任我。你看以去问任何男人、女人,甚至孩子们。”^②

如果说吉姆一度找到了恰当的词汇来形容外部世界的话,读者依旧能够感觉到他的口吃,特别是从第七章到第十章:“他说得还不太流利……但在他的口吃中包含着严肃性。”(康拉德,2008:131)口吃标志着语言和经历

①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3~94页。

② 约瑟夫·康拉德:《吉姆老爷》,蒲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以下相关引文皆出自该书,只标注页码,不再详注,个别引文略有改动。



不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过去留下的阴影依旧干扰着主体的思想,使主体不能顺畅地交流。当吉姆把他的生活与马洛联系在一起时,马洛明白吉姆是在试图把他和他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他不是在和我说,他只是在我面前和一个看不见的人争论,一个对手抑或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帕坦那伙伴——一个拥有他灵魂的人。”(康拉德,2008:182)

吉姆和库尔茨说话时的口吃是因为他们踟蹰于灵魂的未知领域。按照马洛的说法,吉姆说英语就像说一门外语一样,给人感觉他的所思所想和他的语言表达之间有一道鸿沟。他尽管重新获得了自信和别人的信任,然而,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本身的缺点,即导向灵魂阴暗处的“致命一跳”。在第二次失败后,吉姆意识到自己不会再有改正的机会了。他走出屋子,“一言不发”:“他看了看死去的朋友,抬起席子,然后又一声不吭地把它放下。”(康拉德,2008:306)康拉德反复强调,吉姆临死也“没有说一句话”。有人指出,吉姆对自己的勇气和人格统一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类似于对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过去的辉煌和荣耀所产生的怀疑^①。

在《吉姆老爷》中,叙述者和主人公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这种关系依赖于英国绅士的理念及一系列的集体身份,如商船队、英帝国、白人优越论等。这些也集中体现在马洛经常说的一句话中:“他是我们中的一员。”在叙事中,作者极力强调主人公的英国身份,这也似乎在突出英帝国的团结。尽管吉姆未能完成自己的英雄主义理想,与吉姆相反,别的人物的国家身份则被戏剧化了。如帕坦那号上的德国船长以及他在帕图桑时的引路人商人斯坦因。在作品中,马洛试图把他和吉姆与那些不良因素区分开来,这些不良因素包括绅士布朗和德国船长古斯塔夫。可他的这些企图总是不能得逞。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血脉联系、共同的经历以及犯下的同样的过错,还有同样的意识形态。表面上文本似乎要表现出救赎者与单纯追求利益者之间的区别,可身份的认同,诸多的共同点却又一次次否定二者间的差异。

作为英帝国的基石,集体建构的身份在《吉姆老爷》中表现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商船社。作品暗示商船社为英帝国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法国舰长提醒马洛注意别人的看法,而追求完美的布赖尔利船长过于看重“一个国家官员应该是什么样子”,把大家维系在一起的仅仅是得到大家认可的名声而已。对布赖尔利来说,吉姆渎职受审不仅是他个人的过错而且使英国商船社团结合作的名声受损。

《吉姆老爷》中马洛的讲述方式及故事情节的展开呈现一种反话语的模

^① John Richetti,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p557.